

弱势的累积: 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村贫困家庭的生成机制

张翠娥, 王 杰

(华中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主要运用生命历程理论,通过深入访谈法收集贫困者“主诉”的生活史,对农村贫困家庭的生成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贫困家庭的产生是先赋性弱势与事件性弱势在家庭内累积的过程和结果,先赋性弱势累积的影响具有基础性,事件性弱势累积的影响则具有直接性。先赋性与事件性累积双高的贫困家庭,贫困的自我再生机制最强,个体能动性的作用空间最小;先赋性与事件性累积双低的贫困家庭个体能动性的作用空间最大,家庭脱贫潜力最大。

关键词 贫困家庭; 生命历程; 弱势累积; 先赋性; 事件性

中图分类号: C 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17)02-0023-08

DOI 编码: 10.13300/j.cnki.hnwkxb.2017.02.001

农村贫困问题是当前国家高度重视和函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也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既有的对贫困成因的探索大体可以概括为宏观的结构主义、中观的社区文化主义和微观的个体主义三条路径。结构主义取向的贫困研究认为贫困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外在于个人的社会结构如国家、阶级与社会制度等。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所处的世界分工体系和交换的边缘位置决定了其人口更容易陷入贫困^[1]。马克思认为,正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无情剥削,导致了无产阶级的“贫困化”^[2]。国内的研究也显示,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是贫困人口产生的重要原因^[3]。社区文化主义取向的贫困研究强调贫困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社区贫困文化的习得与再生产。Lewis 提出,贫困文化是在既定的历史和社会的脉络中,穷人所共享的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一种生活方式,它一旦形成,就会自我复制并产生长期影响^[4]。我国亦有学者赞同这一观点,认为农村贫困根源于其积淀的贫困文化^[5]。个体主义取向则注重贫困的个体性原因,如个体在不同生命周期面临的贫困风险差异^[6]、人力资本的匮乏^[7-8]、个人获得收入的能力受到剥夺^[9]等。

贫困成因的三条分析路径中,结构主义和社区文化主义都非常重视超越个人的社会性因素的影响,对个人能动性的调适作用则有所忽视;而个人主义取向强调了个性因素的作用,对社会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的重视不足。为弥合个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鸿沟,从而为解释贫困现象提供更为完善、系统的分析框架,国内外学者进行了众多探索。生命历程理论的引入与运用是其中一个较为成功的尝试。生命历程理论由埃尔德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创立,它综合了结构主义、社区文化主义和个体主义对解释贫困产生原因的优势,不仅有利于对特定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而且超越了社会生活研究中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长期隔离状态^[10]。国外学者 20 世纪 90 年代将生命历程理论引入贫困问题的分析后,产生了一系列富有创建性的研究成果。比较典型的有:Leisering 等通过对社会政策与贫穷时间关系的分析,指出国家的福利政策会使个人的生命历程制度化,并提出了贫困生命历程观点的四准则,即时间化、民主化、行动者和传记化^[11]。Dannefer 提出了弱势/优势积累模型,指出随着年龄的

收稿日期:2016-11-02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662016PY111)。

作者简介:张翠娥(1973-),女,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农村社会工作、农村社会保障。

增长,系统化的结构力量会导致“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12]。国内学术界对生命历程理论的研究起步略迟,但近十年来关注逐渐增多,不仅出现了对该理论的详尽介绍^[13],还尝试将其运用于中国具体社会问题分析,其中较有影响的一是用于分析重大社会事件如“文革”^[14]、“计划生育”^[15]等对个体生命轨迹的形塑;二是以此探讨负向生命事件对个体生命轨迹的影响,如感染艾滋病^[16]、早年工作抉择错误^[17]等,但在贫困群体中运用该理论进行的分析并不多,主要有对老年人贫困形成的原因与发展轨迹的分析^[18]和对贫困代际传递与阻隔的定量分析^[19]等有限的尝试。

综上,生命历程理论能够将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相结合,更好地揭示贫困问题,但当前国内虽然有一些学者运用此进行了探索,却或仅将老年贫困者作为分析对象,未能充分展现不同年龄者生命历程的差异性在贫困中的影响,或致力于进行量化描述,难以充分展现研究对象生命历程的个体化背景。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在运用生命历程理论时,多局限于个体自身的生命历程,未能充分展示家庭成员间生命历程的相互关联,对贫困家庭的生成机制分析不足。基于此,本文主要以生命历程理论为依据,以弱勢的累积为切入点,通过动态、纵向的视角来诠释农村贫困家庭的生成机制。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尝试回答以下三个主要问题:第一,个体层面的弱勢累积在农村贫困家庭的生成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第二,弱勢累积并导致农村家庭贫困的机制如何?第三,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贫困者如何才能通过个体能动性改变家庭困境?

一、理论视角与资料来源

1. 理论视角

Elder 指出,生命历程理论有四个核心原则:一是生活的时间与空间,即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与其所出生的历史时代与地域密切相关;二是个人能动性,即个体除了受到所生活的社会历史时期的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外,个体能动性作用和自我选择对自己的生命历程轨迹也有重要的影响;三是相互联系的生命,即个体生活在相互交织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个人的生命历程会受到别人所经历的重大生命事件的影响;四是生命的时间性,即个人生命事件发生时间会严重影响到个人的生命历程轨迹,生命事件发生时间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事件本身^[20]。

本文以生命历程理论为指导,一个基本的观点在于:农村精准扶贫是以家庭为单位开展的扶贫实践,其核心和关键在于“精准”。生命历程理论有助于精准识别贫困的成因,以此实现精准帮扶。

2. 资料来源

本文的资料来源于 2016 年 3 月对湖北省武汉市 H 区贫困村中 43 个贫困家庭的定性调查。既有研究表明,对于长期贫困的成因分析,生活史或家庭史的定性研究方法是非常有效的^[21]。本次调查对于访谈对象选取按照以下标准进行:①属于 2014 年以来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包括低保贫困户、一般贫困户和五保户);②基于研究的目的,主要以家庭致贫源(即导致家庭贫困的人口)为访谈对象,围绕其生命历程展开调查(对于因未成年的子女患重病等原因导致家庭贫困的和因缺乏发展资源等原因无明确的致贫人的,则以家庭核心成员作为访谈对象)。

所有访谈均在受访者家中进行,选择在受访者家里进行访谈一是因为这一场所能够让受访者感到安全,放松;二是因为访谈具有一定的私密性,受访者家中更有助于访谈不受外来干扰;三是在受访者家,调查者可以感受其家庭贫困的基本状况并对受访者提供的资料进行部分检验。资料收集采用笔录为主录音为辅的方式进行。遵循学术规范,所有的个案均进行了匿名化处理。为了清晰的呈现贫困家庭的生成机制,本研究一方面采用受访者讲故事的形式即“叙事”的方式来展现其生命历程,另一方面运用生命历程视角常用的生命轨迹线方法^[18]来描述受访者家庭经济的变化趋势。叙事与生命轨迹线结合的优势在于:其一,能够更直观地呈现贫困形成与发展的轨迹;其二,有助于探索受访者所经历的重大生命事件对其个人及家庭的影响;其三,能够将受访者的人生故事放置于更宏大的社会文化变迁背景中加以理解,避免脱离具体社会情景而架空分析^[19],更重要的是,受访者弱勢的累积也能在其故事与生命轨迹线中呈现出来。

二、弱势累积的类型与特征

累积的劣势^[22]是生命历程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析概念。胡薇指出,累积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先赋性因素随时间的推移持续地发挥作用;二是先赋性因素与其他因素产生相互传递作用($A \rightarrow B \rightarrow C$),或与其他因素相互结合共同发挥作用($A \cap B \rightarrow C$),并据此将累积性因素区分为“初始的累积因素”与“时间上的累积因素”^[17]。借鉴胡薇对累积概念富有启示的解析和划分,

结合对访谈对象生命历程中弱势累积的分析,本文依据

弱势的来源将其分为先赋性弱势和事件性弱势两个维度。先赋性弱势指生而具有的弱势,包括出生时的时代特征、地域环境、家庭关系、健康状况等方面的弱势,这些先赋性弱势是个体生而具有,无法选择和改变的。事件性弱势指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所遭遇的各种负向生命事件。基于此,本研究将贫困家庭依据其成因划分为如图1所示的4种类型。其中,A类为双高弱势累积型;B类为先赋性弱势累积主导型;C类为事件性弱势累积主导型;D类为双低弱势累积型。

1.A类:双高弱势累积型

A类贫困家庭的基本特征主要有:社会性先赋因素(时代环境、地域、家庭社会经济状况等)或生理性先赋因素(性别、健康状况)处于明显弱势,随后的生命历程中家庭又不断遭遇各种负向生命事件。先赋性弱势与负向生命事件之间相互作用,不断强化和加深家庭困境,由此A类家庭一般陷入贫困的时间长、程度深,且具有很强的自我再生机制。这类贫困家庭也是当前政学两界最关注的类型,他们是长期贫困和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来源。

案例1:阿红(女,1945出生,71岁)的家庭是A类的典型,其生命轨迹如图2所示。阿红的父亲在其出生前就去世了,母亲身体状况本来就差,独自带着三个儿子和阿红,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生活状况可想而知。家庭贫困不仅导致阿红的两个哥哥早夭,而且使其不得不在年幼时就跟随母亲和哥哥乞讨过活。1965年对阿红是一个转机,20岁的她进入一家猪鬃场上班。因为出生贫农加上吃苦耐劳,1967年阿红被选为妇联队长。之后结婚生子,因丈夫也是贫困家庭出身的农民,家庭经济始终处于贫困边缘,但自1987年儿子初中毕业后开始到外地打工后,家庭经济状况逐渐好转。新的转折出现在2003年。这一年,1岁半的孙子被发现患有心脏病。做了手术的孙子心脏病好了,却因手术事故下半身瘫痪。此后,经历了3年的医疗官司,最终医院以赔偿16万元而告终。孙子瘫痪后,儿媳觉得生活没了指望,常年在外打工不回,也不寄钱回家。2009年,阿红的丈夫查出患有癌症,因无钱医治于2010年去世。因儿媳一直未尽到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媳的责任,儿子坚决离了婚。2016年,儿子为给孙子治疗不得不外出打工,留下年迈的阿红独自在家照顾病瘫的孙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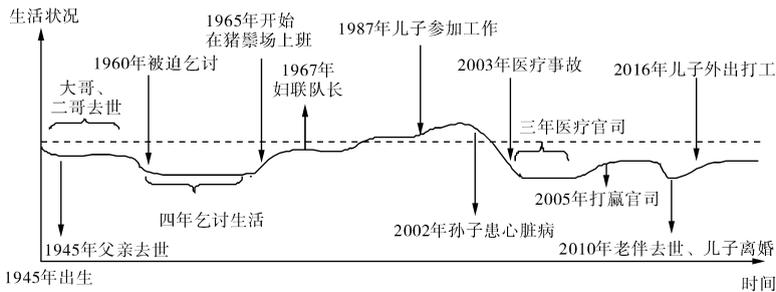


图2 阿红的生命轨迹^①

^① 图2的横坐标表示时间,纵坐标表示被访者自评的家庭生活状况,与横坐标平行的虚线表示被访者自我感知的当时的贫困线。图3~图5同图2。

阿红的故事为我们呈现了先赋性弱势和事件性弱势的共同钳制。出生于解放前的单亲贫困家庭,先赋性家庭弱势不仅使阿红无法获得良好教育,而且使其在成长中难以获得家庭的支持。虽然这些家庭弱势对其生命轨迹的影响并不是简单负向的,在某些情境下也能成为有利因素,如其极端贫困的家境使其作为贫农而在政治分层中产生了积极影响。导致阿红家庭陷入贫困难以自拔的是近年家庭成员的一系列负向生命事件(孙子患病→遭遇医疗事故→儿子儿媳关系不和→丈夫患病→丈夫死亡→儿子儿媳离婚),这一生命事件链充分展示家庭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每个成员的负向生命事件都会影响整个家庭的发展。孙子的患病不仅直接导致了家庭的贫困,而且,作为致贫源,阿红的孙子尚未成年,其疾病对家庭的影响将是长期的。

相对于由于时代和家庭带来的先赋性弱势,生理性先赋因素弱势具有更强的钳制力,而且其影响很难通过个体的努力得到缓解。如同属 A 类的个案阿明,一出生就患有轻度智力障碍,加之家境贫寒,这不仅导致他无法像正常人那样获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而且无法找到适婚对象,无法建立新的家庭,家人先后去世,年已 70 的阿明孤身一人,生活极其艰辛。而现年 34 岁的个案阿英,出生后身体发育异常,一开始以为是营养不良;4 岁时疑似脑瘫,但因家贫没有到大医院确诊;10 岁时阿英的病情还是没有好转,母亲带其到大医院去看,医生确定是脑瘫。父母无力筹措治疗所需巨额医药费,选择将阿英带回家保守治疗。因阿英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家人长期照顾,每月还要不小的医疗开支,家庭长期处于贫困,而近年来父母均多次患病,更是令家庭经济雪上加霜。

2.B 类:先赋性弱势累积主导型

与 A 类相比,B 类家庭较少遭遇连续负向生命事件的困扰,家庭贫困主要源于其先赋性弱势。B 类家庭在生命历程上共性特征主要有:出生时的家庭条件差或自身患有先天性疾病,虽未遭遇明显负向事件,但没能力摆脱先赋性弱势因素的影响。这类贫困户陷入贫困的时间一般较长、贫困程度较深。

案例 2:农村贫困家庭出生的阿杰(男,49 岁,1967 年生),患有家族遗传性的高度近视。由于家境困难,阿杰 9 岁才开始上学,但小学三年级时因视力问题不得不辍学了。1989 年结婚时父母都已经去世,结婚花费都是由哥哥姐姐支援的。由于家庭贫困,二儿子出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妻子娘家度过的。受身体限制,阿杰没有像同村年轻人那样外出务工,为了改善家计,他从 1995 年开始承包别人家的 3 亩地,直到 2000 年眼部疾病加重才没有继续承包。2006 年阿杰的视力进一步恶化。2011 年二儿子读高职,每年 3 000 多元的学费成为家庭经济的重大负担。2013 年大儿子开始外出打工,家庭状况稍微改善。2014 年二儿子也外出打工,家里经济进一步好转。2015 年阿杰获低保(如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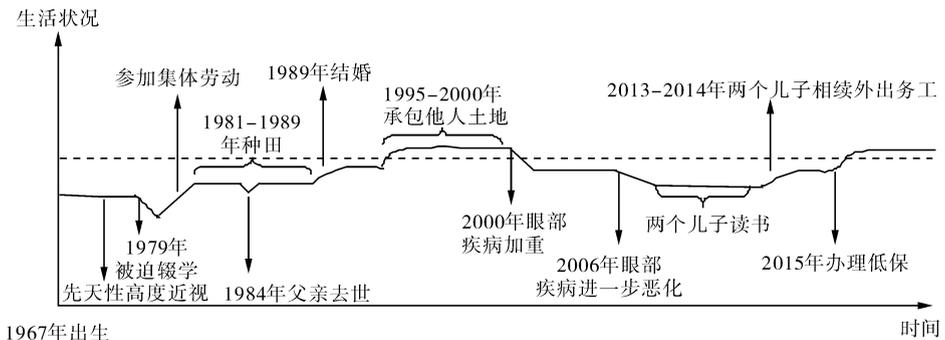


图 3 阿杰的生活轨迹

已有研究表明,教育是实现个人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是否接受教育以及接受教育的多少都会对个人的生命历程有着重要的影响。阿杰由于先天性疾病,只读了两年小学。正是由于阿杰过早的辍学,他向上流动的机会受到了限制。先赋性的健康弱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阿杰生活的负面影响不断加强。阿杰眼部疾病的两次恶化,都对阿杰家庭的经济状况造成了重大影响,而出生时家庭的弱势经济地位,也持续影响着阿杰的家庭生活。好在阿杰虽然受到先赋性弱势因素的较大影响,但在成

长过程中没有遭遇重大的负向事件,随着两个儿子先后毕业并参加工作,家庭经济状况逐步改善。

同属B类的阿兰和阿方就没有阿杰好运。过强的生理性先赋因素弱势导致他们根本无法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虽然他们暂时可以依赖家庭生活,他们的家庭也没有遭遇大的负向事件,但家庭长期处于贫困线下,已经难以面对哪怕小小的风险。由于先赋性弱势多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难以轻易改变,因此极易与事件性弱势形成累积,这也使B类贫困家庭极易转化为A类贫困家庭。

3.C类:事件性弱势累积主导型

C类贫困家庭的共性特征主要有:先赋性因素并不差,但一系列负向生命事件不断累积,家庭由此陷入贫困。这类贫困家庭陷入贫困的时间大多较长、程度较深。

案例3:阿军(男,41岁,1975年出生)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亲是一个退役军人,父母关系良好,无明显先赋性弱势。1983年,阿军的父亲突发支气管扩张、吐血,住院花费3万,这给家庭经济带来沉重打击。1985年阿军的三弟出生后不久发现智力障碍,家庭经济进一步恶化。1991年阿军初中毕业,考虑到一个弟弟在读初中,另一个弟弟需要父母长年照顾,加之家庭经济状况不好,阿军被迫选择到外地打工。“当时我也想去读书,我挺喜欢读书的,但家里状况不好”,家庭遭遇的一系列负向事件(父亲生病∩弟弟患病→贫困→辍学)使其难以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

1991到2012年,阿军在H市做室内钢筋捆扎工作,“扎钢筋虽然辛苦,但自己只读了个初中,很多好的工作做不来”。2006年,阿军的父亲在村里遭遇车祸,脾脏破裂,花费近3万。2012年,阿军在外做工时遭遇车祸,肇事司机支付了医疗费后,至今一直拖欠着3万赔偿费。由于车祸对身体伤害加上高血压等的影响,阿军患上了慢性肾炎,2015年年底查出患有尿毒症。2016年2月后,病情恶化,住院二十多天,花费3万多。因身体承受不了血透,阿军不得不选择在家进行价格更贵、疗效更差的腹透(如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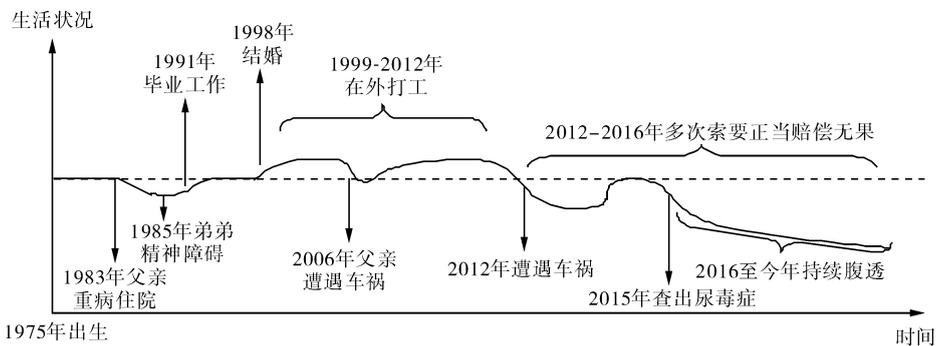


图4 个案阿军的生活轨迹

阿军成长在改革开放时代,出生时家庭经济状况一般,因此先赋性因素对其家庭陷入贫困影响相对较弱;出生后一连串环环相扣的负向生命事件是导致其家庭贫困的主要原因。父亲突患疾病,是阿军家庭陷入贫困的开端。阿军自己也由于不幸遭遇的一次车祸和突如其来的尿毒症,让家庭彻底陷入了贫困的深渊。父亲车祸事件、自己车祸事件以及患病事件,这些突发性的生命事件交互累积(A∩B∩C),阿军在访谈中反复用“多灾多难”来描述自己和生活家庭的生活历程。作为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却丧失劳动能力,阿军生病后需要妻子长期照顾,这使得妻子也无法外出打工,一家四口两个主要劳动力都没有长期稳定的收入,却需要支付高昂的医药费。为了应对家庭困境,调查时阿军与妻子在村里开了一家简陋的早点店,但生意惨淡。因此,个体能动性在强事件性弱势累积的情况下,发挥作用的空间有限,特别是重症这种负向生命事件一旦发生在家庭主要劳动力身上,对家庭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和难以承受的。值得关注的是,重病的影响对象并不限于患病者,不仅阿军的妻子受到了波及,阿军发现,“大女儿现在有些厌学情绪”。主要由一连串负向生命事件所造成的家庭贫困,也体现

在阿黄和阿庆的家庭上,他们的家庭在短时间内连续遭遇重病、意外等事件而致贫。

4.D类:双低弱势累积型

与前三类贫困家庭不同,D类贫困家庭不仅先赋性因素(家庭经济情况、身体健康状况等)并无明显弱势,负向生命事件的累积性也不突出。在没有陷入贫困前,D类家庭的经济状况大多较好。这类家庭陷入贫困的原因大多是近期家中主要劳动力遭遇重大的负向生命事件(重症、车祸等)。因而此类家庭陷入贫困的时间一般较短、程度相对也较轻。

案例 4: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的阿星(男,64岁,1952年生),初中未毕业就辍学回家从事集体劳动。23岁外出务工,1981年分田到户后,他回到村里从事面粉和面条加工生意,家庭条件逐步改善。1983年阿星放弃了村里的面粉加工生意,去政府部门上班,当了11年的联防队员,但1994年街道合并,政府部门进行人员裁减,应“年轻化、知识化”的要求,阿星被迫下岗了。下岗后阿星外出做了10年的建筑工,后逐渐对苗木生意有了兴趣,2004年开始培育和贩卖苗木。生意最好的时候,苗木销售一年价值高达几十万,“苗木生意给家里来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大翻身”。两个儿子先后于2007年和2011年初中毕业后外出打工,家庭经济更为宽裕,2011年家里花费近20万修建了三层楼房,成为村里的富裕户。转折点出现在2013年,阿星被查出患有尿毒症,每周两次透析,开支巨大。而因阿星患病,苗圃无人照管,生意变差,家庭收入锐减。为此,妻子被迫到一家养老院打工挣钱。2014年阿星成功申请低保户,昂贵医疗费用得以减轻,而且每个月可以领到低保金,缓解了家庭困境(如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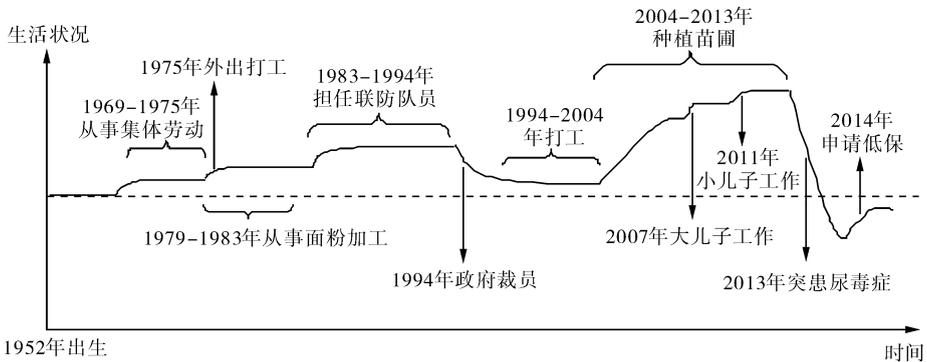


图5 阿星的生活轨迹

阿星出生时身体状况良好,家庭经济状况一般,先赋性弱势累积弱。通过自己努力(从事面粉加工、担任联防队员、种植苗圃等),阿星的家庭经济状况获得了明显改善。特别是2004年开始苗圃种植后,家庭收入大幅提升。使阿星家庭陷入贫困的直接原因是其2013年突患尿毒症,大笔医疗费用的开支使家庭经济失衡。身患重症的阿星,不仅无法继续打理苗圃生意,而且需要妻子就近照顾,两人的经济收入都受到影响。所幸子女均已成年,他们在成长中虽未获得明显优势,但也没有明显的弱势累积。低保金的获得,有效地缓解了阿星的家庭困境,家庭其他主要劳动力都有劳动能力,拥有较为稳定的收入,这些都有助于阿星的家庭脱贫。

三、弱势累积的致贫机制

四类贫困家庭生命历程的分析可见,先赋性弱势与事件性弱势对个体及其家庭贫困的影响是有差异的,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弱势是如何累积并导致家庭贫困。比较四类贫困家庭的生命历程特征不难发现,先赋性弱势因素与事件性弱势因素紧密相连,事件性弱势因素往往在先赋性因素基础上发挥影响,先赋性弱势因素对家庭的负面影响常常在事件性弱势的作用下被进一步放大。总体来说,先赋性弱势对贫困个体及其家庭的影响具有基础性;事件性弱势累积则具有直接性。考虑到先赋性因素一旦产生,其影响是贫困个体及其家庭难以改变的,因而本文着重探讨事件性因素的致贫机制。

调查结果显示,并非所有的负向事件都会形成累积并导致贫困。从前述案例看,负向事件累积致贫一般来说有三种情形:一是负向事件反复发生,一个事件导致的家庭经济困境未能得以解决又新增一个事件,此时事件的影响具有累积性,当弱势累积达到一定的程度,家庭陷入贫困。二是家庭经济由于先赋性因素影响本身处于贫困边缘,抵御风险的能力极弱,此时哪怕一个小小的负向事件,也会与先赋性因素形成累积由此使家庭陷入贫困。第三种情况则是单一负向事件的影响很大或者事件的影响具有长期性,使家庭难以迅速恢复,由此陷入贫困。案例同时显示,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导致弱势累积的负向事件不仅可以是一个家庭成员的多次事件,如反复生病或先后发生不同类型的事件,还可以是多个不同家庭成员的类似或不同事件,如多个不同家庭成员生病或者遭遇意外等。由于家庭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每个人的生命事件都会对其他家庭成员产生影响,因而,不同家庭成员的负向事件会在家庭单位内进行累积。

更进一步的分析可见,事件性弱势的累积与否,与负向事件发生的时间、发生的对象、发生的频率、发生的间隔、事件的程度等具有紧密的关系。发生在核心家庭成员(即家庭主要劳动力)身上影响更大,波及的家庭成员人数越多影响越大,发生的频率越频繁影响越大,发生的间隔时间越短影响越大,事件的程度越强影响越大。一般来说,负向事件累积的可能性取决于事件的时间性。任何一个事件均具有时间性,即事件发生的时点与持续的时长。负向事件发生的时点距离上一个负向事件越近,累积的可能性越大。负向事件持续的时间越长,累积的可能性越大。负向事件累积的程度则取决于事件的影响力。任何事件都会产生影响,影响力主要表现为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影响的人员范围越大,累积程度越大。影响带来的经济社会代价越大,累积程度越大。而事件性弱势累积的致贫条件则是当事件性弱势累积使家庭收支失衡,家庭经济陷入贫困线下且难以在短期内回复到平衡状态。

那么,事件性弱势累积是如何导致家庭贫困的呢?由前述案例可见,疾病、失业、离异、交通事故等不同的负向事件,主要通过影响家庭的劳动力数量与质量从而导致其收入锐减和破坏家庭成员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由此支出大增导致家庭收支不平衡从而陷入贫困。其中,对家庭劳动力数量与质量的影响既包括对劳动力的知识、技能、资本、资源获取能力的影响从而直接导致贫困,也包括对其婚姻选择和子女生育、教育的影响,从而使其无法实现家庭劳动力的再生产导致其脱贫能力减弱。

在致贫机制的分析中,个体能动性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个体能动性是其在受到先赋性弱势和事件性弱势双重钳制的情况下,个体自身对生活轨迹的调适,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甚至消解先赋性弱势与事件性弱势的巨大负向影响。从案例可见,个体能动性在A类贫困家庭中,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最小,特别是A类贫困家庭中的五保户,他们往往因先赋性(健康、家境等)弱势强,导致后期的教育、婚姻等方面的弱势,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人群都会陷入贫困,需要政策来兜底。B类和C类贫困家庭,个体能动性有较大的作用空间,在扶贫工作中,应充分激发家庭的潜能,尽量阻断B类贫困户转化为A类的路径。D类贫困家庭的抗逆力最强,个体能动性发挥作用的空间最大。总体来说,个体能动性的作用空间随A→B→C→D递增。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运用生命历程理论,以累积的弱势性为切入点,对贫困家庭的生成机制进行了剖析。研究得到以下三个基本结论:

第一,贫困不仅是一个家庭在某一时点上发展状况的静态判断,也是家庭在一定时期发展状况的持续状态,更是弱势在家庭内累积的过程和结果。家庭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先赋性弱势和事件性弱势不仅会直接作用于个人,而且会在整个家庭中进行累积。因而,探索贫困的成因必须关注贫困者的家庭,关注其弱势累积的过程。

第二,先赋性弱势的影响具有基础性,事件性弱势的影响则具有直接性。由于先赋性弱势通常长期存在,因而很容易与事件性弱势共同作用形成累积。事件性弱势累积的可能性取决于负向事件的时间性,累积的程度则取决于事件的影响力。累积的弱势主要通过影响家庭的劳动力数量与质量从而导致其收入锐减和破坏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由此支出大增致使家庭收支不平衡从而陷入贫困。

第三,个体并不是命运的被动接受者,先赋性弱势因素与负向生命事件在贫困家庭的生成过程中的作用受到个体能动性的影响,但个体能动性在四类贫困家庭中发挥作用的空間与影响力具有差异性,呈现出由 A→B→C→D 逐渐递增。

精准扶贫是一种实践型精准^[23],因而必须动态地、系统地来分析贫困的成因。本文的研究显示,从贫困的成因来看,避免弱势的累积是脱贫行动的核心和关键。具体来说,首先,要减少先赋性弱势累积的形成和影响,特别要减少新生婴幼儿的先天性残疾和重病,这对于其个人和家庭的发展来说影响都是最大的。保障所有儿童都能获得良好的基础教育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将为个体及其家庭的脱贫奠定良好基础。其次,在事件性弱势中,影响最大的是重病和意外,它们的影响是长期的和重度的,这需要国家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使个体及其家庭的其他事件不形成累积,避免因此陷入长期贫困。最后,要特别关注区域环境对于贫困的影响。不少先赋性的因素都是区域性的,如在偏远农村,区域环境使生活于其中的农民在教育、生产资源、医疗条件、自然灾害等上都面临更恶劣的环境,这些都会深刻的影响他们的发展。改善整体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是减少先赋性弱势累积和事件性弱势累积的重要举措。只要弱势不构成累积或累积不超过家庭的承受能力,家庭就可以利用自身的复原力,逐渐恢复平衡。

参 考 文 献

- [1]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3卷[M].郭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 [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87.
- [3] 田野.对我国城市贫困人群问题的思考[J].理论导刊,2007(2):25-26.
- [4] LEWIS O.The culture of poverty[J].Scientific American,1966,215(4):19-25.
- [5] 刘龙,李丰春.论农村贫困文化的表现、成因及其消解[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7(5):583-585.
- [6] ROWNTREE B S.Poverty: a study of town life[M].Bristol:Policy Press,1901.
- [7] 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M].蒋斌,张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 [8] 刘修岩,章元,贺小海.教育与消除农村贫困:基于上海市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7(10):61-68.
- [9] 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M].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10] 李强,邓建伟,晓箏.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J].社会学研究,1999(6):1-18.
- [11] LEISERING L,LEIBFRIED S.Time and poverty in western welfare states:United Germany in perspectiv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 [12] DANNEFER D.Cumulative advantage/disadvantage and the life course:cross-fertilizing age and social science theory[J].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2003,58(6):327-337.
- [13] 包蕾萍.生命历程理论的时间观探析[J].社会学研究,2005(4):120-133.
- [14] 刘精明.“文革”事件对入学、升学模式的影响[J].社会学研究,1999(6):19-36.
- [15] 胡平,朱楚珠.计划生育与中国妇女生命历程变化探讨[J].中国人口科学,1996(4):21-26.
- [16] 张翠娥.社会性别与艾滋病——对一位女性艾滋病患者生命历程的性别分析[J].妇女研究论丛,2008(3):12-23.
- [17] 胡薇.累积的异质性:生命历程视角下的老年人分化[J].社会,2009(2):112-129.
- [18] 徐静,徐永德.生命历程理论视域下的老年贫困[J].社会学研究,2009(6):122-144.
- [19] 陈功全,程蹊.生命历程视角下的贫困代际传递及阻断对策分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4):101-106.
- [20] ELDER G H.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life course theory[M]//MORTIMER J T, MICHAEL J. 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 New York: Springer, 2003.
- [21] 左常升.国际减贫理论与前沿问题(2014)[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
- [22] MERTON R K.The matthew effect in science: the reward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 of science are considered[J].Science,1968,159(3810):56-63.
- [23] 王思斌.精准扶贫的社会工作参与——兼论实践型精准扶贫[J].社会工作,2016(3):3-9.

(责任编辑:金会平)